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刘玉堂,姜新琪.40年来炎帝神农文化研究回顾与反思[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8(6):1-8.

40年来炎帝神农文化研究回顾与反思

刘玉堂 姜新琪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炎帝神农文化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象征,是赓续千年的中华文明之源和中华文化的标识性符号。40年来,有关炎帝神农文化的研究在身份辨析、故里考证、精神凝练、贡献梳理与信仰剖析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呈现出地域性与整体性探讨并举,本生态与衍生态分析并存,以及方法与视域日益拓展等主要态势。立足社会语境与既有研究,未来应从比较研究、现象研究与理论研究等层面加快构建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意义的研究体系,以形成对炎帝神农文化的整体性认知,拓展其研究视域并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关键词:炎帝神农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顾反思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5)06-0001-08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举措。炎帝神农文化层累着华夏儿女的集体智慧,是中华文化的根脉与灵魂所在^{[2](P155)},能够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与实践镜鉴。从纵向看,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炎帝神农文化生发于中华民族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的生产生活实践,其在动态演变过程中赓续核心内蕴,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具有强大的价值感召力。从横向看,炎帝神农文化具有显著的空间扩布性。《淮南子·主术训》说炎帝神农部落:“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暹

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3](P610~611)}空间层面的跨地域实践,不仅拓展了其多元面向,亦在无形中建构了地域间的内在联结,彰显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围绕炎帝神农文化的相关探讨肇始于20世纪初,彼时其尚未成为独立研究对象,而主要依附于“三皇五帝”的辨伪研究。聚焦炎帝神农文化的专题研究勃兴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已形成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宏观性与微观性的研究格局。“现代学术史也是文化变迁史”^[4],因而有必要系统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炎帝神农文化研究脉络,揭示其演进规律,进而立足时代语境,更好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

二、炎帝神农文化研究的基本状貌

炎帝神农文化是赓续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收稿日期:2025-08-22

基金项目: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重大种子培育项目“故事诗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话语关系研究”(CCNU24ZZ030)

第一作者简介:刘玉堂(1956-),男,湖北大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荆楚文化史、长江文化研究。

通信作者:姜新琪(2000-),女,山东潍坊人,主要从事民俗文化、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研究,E-mail:727124120@qq.com.

化,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与价值内蕴,四十年来,学界围绕称谓关系、故里区域、精神特质、历史贡献以及信仰实践等维度展开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身份辨析:称谓分合与身份叠合

历史文献对炎帝与神农的记载历经从分称到合称的转变,引发了学界的广泛探讨,其主要聚焦于“炎帝与神农是否为一”及“二者称谓合流的缘由与时间”两大核心议题展开。

在炎帝与神农的身份关系方面,学者主要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了诸多考辨。张玉勤结合对传说、历史考古及社会发展规律的综合考察,提出神农与炎帝属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5]林生基于详实的史料梳理提出,炎帝的传说始见于春秋末年,神农氏的传说始出于战国中期,两者各不相涉,自汉代之后开始合一。^[6]余卫国主张区分历史与文化学意义上的真实,指出在文化意义上,炎帝与神农同为一,其合称的文化意蕴为文化价值观念的选择与重构、中国社会统一与变革的需要。^[7]周及徐关注历史意义上的真实,基于对26种先秦及汉初文献有关炎帝与神农记载的剖析,指出炎帝与神农并非一人。^[8]田兆元等结合时代语境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认为炎帝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独称,而是特定首领位置的称号,其不同称谓是不同时期价值取向的差异所造成的。^[9]

在炎帝与神农称谓合流相关问题上,学者围绕二者合称的演变及缘由展开了多维度探讨。龚维英较早关注到炎帝与神农称谓合流的动因,认为其是战国末期的儒者为了适应大一统历史趋势,对古史进行综合整理的结果。^[10]刘玉堂等关注到神话与传说的动态性,通过对文献的历时性考察,从时代背景、生产方式等方面剖析炎帝、神农氏、烈山氏的分合及其因由。^[11]杨善群基于对古籍内容的梳理与辨析,认为刘歆的《世经》为炎帝与神农氏“合二为一”的最早记载,其动因则是为统治者服务。^[12]李桂民指出,炎帝、神农与烈山氏称谓的融合形成于先秦时期,是先民对于早期历史的认同和文化自觉的表现,此种认同使得古中原地区成为辐射四方的中心,体现出中华民族浓厚的向心力。^[13]雷欣翰认为炎帝与神农的合流始于汉代,其间将二者发明互相附会的叙述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神农造琴传说。^[14]宋海燕系统梳理了炎帝与神农称谓的融合历程并分析了其多元的内外推动因素,涵括“五德终始”说、炎帝与南方的联系、炎帝与神农、烈山氏复杂的共同点等。^[15]庞

政等以图像材料为切入点,通过剖析炎帝与神农图像的差异性特征及其融合轨迹,认为东汉后基本完成了对炎帝神农为一人的认知转变。^[16]

(二)故里考证:核心区域与流衍范域

炎帝神农足迹的流动性、历史记载的模糊性以及称谓的不固定性,使其故里所在地具有不确定性。伴随炎帝神农始祖认同的日益深化,多地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为其所属地为炎帝神农故里寻来学理性支撑与合理性论证,由此引发了学界的广泛探讨,形成了山西上党说、陕西宝鸡说、湖南炎陵说、湖北随州说等代表性观点。

聚焦炎帝神农故里的研究始于历史学领域,江长林等结合史籍记载论述炎帝神农出生于湖北厉山。^[17]胡立志等基于前人见解与对史籍、文物、遗址等的综合考证,提出神农氏族应是起源于南方的母系氏族部落,并进一步论证炎帝神农氏生于随州厉山。^[18]李汉伟结合自春秋战国经两汉、魏、晋、唐宋至今的丰富文献记载,论证炎帝神农生于随州,并认为“宝鸡说”缺乏古代典籍依据,“姜水说”的典籍援用存在差错。^[19]闵宗殿通过对神农传说事迹的分析,认为神农活动的区域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并由西向东发展。^[20]蒋南华基于对文献记载与民俗的综合分析,提出炎帝神农氏为我国南方各民族的始祖。^[21]张序民依托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从时间次序、时代特征与部族迁徙等方面,论证在宝鸡的炎帝应处于创业阶段。^[22]梁绍辉等围绕文献记载、名物民俗以及考古资料进行探讨,认为炎帝族的发祥地位于湖南南部的湘江上游。^[23]不同于对炎帝故里做出明确界定的观点,韩致中运用模糊学和传说圈理论进行探讨,提出存在分别以厉山和宝鸡为核心的两个传说圈,并指出炎帝神农部落可能最早兴起于西部地区,后大部分进入包括厉山的内地。^[24]巫瑞书进一步提出了陕西宝鸡、湖北厉山、湖南酃县等是处于不同时期与地域的三个炎帝神农传说圈,并重点阐释了酃县传说圈。^[25]

在多学科日益交叉融通的背景下,学者将研究视野从历史学拓展至民俗学、人类学、符号学等学科领域,整合历史文献与田野资料等开展综合性探讨。林河运用符号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视角,得出炎帝神农诞生于长江中游的结论,拓展了炎帝神农文化的研究方法。^[26]刘玉堂等突破以往对炎帝神农出生地的静态研究范式,提出“生地”不应被限定为出生地,而应理解为生息劳作之地,并系统论述了神农与炎帝称谓分立与合一前后的生息区

域。^[27]侯文宣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视角切入,通过实地考察与民间访谈资料弥补史书记载的局限性,探讨晋东南地区鲜活的炎帝传说与民俗文化。^[28]刘毓庆聚焦于山西上党地区,较全面地梳理了此地有关炎帝神农的文献记载、方志碑刻、考古发现、民俗信仰、民间传说等,并通过资料的相互印证,指出神农氏应起源发展于太行山地区。^[29]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文化向心力,促动学者从故里考证的分异性研究,转向对炎帝神农作为中华民族共祖的统合性探讨。钱宗范等认为炎黄是英雄人物的象征,不应将炎帝视为具体人物、具体地区文明的代表,而应达成炎黄两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之共识。^[30]宋超聚焦于解析炎帝神农传说流行的轨迹,提出“姜水”“陈”与“长沙”是炎帝传说流衍过程中重要的地理标志,其整合了各地炎帝传说,最终形塑了炎帝神农的华夏民族始祖形象。^[31]马平安强调神农氏代表特定时代,亦为氏族部落群体,指出湖南、陕西、湖北、山西、河南等地,都是神农氏族发祥的核心区域,其发祥呈现出“满天繁星,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特质。^[32]

(三)精神凝练:价值内核与实践意义

作为人文始祖,炎帝神农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在历时性实践中积淀的生存智慧与对理想品格的期许,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与现实指导意义。

刘芳等聚焦于炎帝神农舍己为群的精神,从发生学视域探析其生成的背景,包括生产力低下、群体安全需要等,并进一步指出,此精神体现了其作为华夏始祖自强不息、不畏艰险、勇于进取、率先实践,以及英雄主义色彩等特有精神风貌。^[33]陈望衡认为,炎帝神农精神是中华民族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将其归纳为自强、大公、原创、献身、厚德、乐天,并立足当代语境强调发扬其创业精神。^[34]许启贤基于炎帝传说探析中国传统美德,将炎帝时代的道德特质提炼为坚韧不拔、团结拼搏、民主友爱等。^[35]陈胜利结合文献记载与当代社会实践,从炎帝神农首创农耕、奋斗实绩、利民思想以及炎黄子孙的血脉认同出发,阐释了炎帝神农开拓创新、自强不息、为民奉献与爱国主义精神,并强调了炎黄文化的文化整合功能。^[36]2005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宝鸡市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了“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间的交流探讨促进了炎帝神农精神研究的深化。如刘玉堂等对炎帝神农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及其时代价值进行了系统探讨,将其提炼为无私奉献、凝聚认同、开拓创新、自强进取、亲民务实、公平和谐等精神特质,并进一步阐释其时代价值。^①何星亮聚焦于炎帝神农的创新精神,从科技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方面剖析其表现形式,主张继承创新精神以为中华文化注入活力。^②张文立等则围绕炎帝的重德尚和精神,从族群关系与治世之策切入进行探讨。^③

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有学者从管理学、文学等学科视域出发,持续拓展炎帝神农精神的研究范畴。唐志丹等从管理学视域出发,探析炎帝神农的农业与制度管理思想,并进一步阐释其以人为本、贵和尚中、自强不息等精神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影响。^[37]段友文等立足农业文明,综合运用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与民俗文献,梳理炎帝神农神话生成的文化生态及其纵向传承与横向扩布,认为炎帝作为华夏文化符号的象征,是凝聚国民情感、维护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精神财富。^[38]马平安认为炎帝精神是中华文明的血脉基因,强调加强对炎帝精神的阐发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力。^[39]

(四)贡献梳理:创新实践与符号价值

炎帝神农作为兼具多重人格的文明始祖与箭垛式人物,其贡献呈现出历时性层累与动态性拓展的特征,主要涵括教民耕种、创制耒耜、首倡交易、发明医药、作陶为器、台榭而居等创新实践,学界围绕其具体内容与符号意义进行了深入研讨。

杨范中基于历史文献与遗址遗迹,较为系统地探析了其在农作物种植、耒耜、陶器制作与医药发明等方面的贡献。^[40]吴家阔以神农得茶解毒的民间传说为研究对象,梳理了神农用肚子鉴别茶叶,用赭鞭鉴别茶叶以及得茶自救与煮水得茶的传说。^[41]霍彦儒从调整饮食结构、改变饮食方式以及丰富饮食品种三方面分析炎帝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贡献。^[42]唐朝阳等聚焦于神农创制音乐礼制的贡献,认为其具有统一思想、规范意识、实现社会和谐、陶冶性情等功能。^[43]丁凤英等主要从医学角度阐释炎帝神农的药

① 刘玉堂、易德生《炎帝神农文化所蕴涵的民族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

② 何星亮《炎帝与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

③ 张文立、田静《炎帝的重德尚和精神》,《“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

业功绩及其思想内蕴。^[44]张玲丽认为炎帝神农不仅奠定了中医药“重经验与实践”与“药食同源”的根基,亦在精神层面开拓了为民献身的“大医”精神。^[45]值得注意的是,学者对炎帝神农贡献的探讨,并未囿于农业、医药等具体领域的成就考辨,而是自觉阐释其中蕴含的精神品格,彰显出中华民族“道器合一”的独特认知范式。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内蒙古时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的重大论断。^[46]伴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国家战略与民心所向,学界对炎帝神农贡献的研究从具体事象剖析升华至符号价值探析。刘玉堂等系统论述了炎帝神农称谓、传说、功绩及祭典等,并深入剖析其所表征的中华民族精神,立足时代语境探讨炎帝神农文化对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意义。^[47]孟琳峰基于对炎帝叙事形象的流变的梳理,探讨其在国家建构中的认同形塑机制,并进一步阐释其对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意义。^[48]吴新锋等综合神话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基于对湖南炎帝陵祭祀在地化实践的历时性考察,探讨其在增强中华历史文化认同、保障中华文明连续性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关键作用。^[49]王爽等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运用统计工具广泛搜集清代至民国时期记载炎帝的方志史料,梳理其中关于炎帝叙述的内容及特征,以探讨炎帝文化之于中华文化认同的意义。^[50]

(五)信仰剖析:具体事象与整体语境

民众信仰是炎帝神农文化传承的核心动力,其外化于神话传述、祭祀仪式等实践中,并呈现出地方性与统一性的耦合共生。基于炎帝神农文化信仰的地方性特质,学者多聚焦特定地域展开探讨,推动了炎帝神农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

袁珂系统梳理了《山海经》《国语》《史记》《述异记》《博物志》《渚宫旧事》等古代典籍中的炎帝传说,并从炎帝本人、妻女、臣属等主体入手进行分类阐释^[51],为后续炎帝传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盛磊较为全面地阐释了随州官方与民间的炎帝神农祭祀概况,并基于灵验故事探讨随州人民的炎帝神农信仰。^[52]刘守华关注到炎帝神农传说在湖北的口头传承,剖析其文化特点与价值,指出其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征。^[53]吉成名立足功能主义视域,认为炎帝祭祀具有延续祖先思念、赓续历史记忆、寄托生活向往、激发创造力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

用。^[54]贾志杰等以神话的地方性为研究核心,主张通过地方活态传承和讲述的口承神话补充文献记载,以呈现炎帝的多元样貌。^[55]张硕聚焦于宋代炎帝祭祀与诗歌书写,梳理宋代国家祭祀炎帝的类型,并探析诗词所表征的宋人精神世界。^[56]崔莹莹基于文化建构理论,探究了沁阳地方神农传说的景观生产与叙事行为,认为景观生产应回归本土文化。^[57]曾园以炎帝神农神话为研究对象,剖析其语言、仪式以及图像景观叙事传统,并探讨其当代发展策略。^[58]

作为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炎帝神农信仰的研究范式深嵌于民俗学的学科发展之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民俗学界日益从对民俗事象的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59],促动学者在时空、受众、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维因素的互动整合中探讨炎帝神农信仰。郭艳芳将研究视域置于山西东南部,在梳理该地炎帝传说与信仰的基础上,探析两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在民众生活中的作用。^[60]赵翠翠聚焦于陕西宝鸡地区的炎帝信仰,梳理其在当代重建过程中所呈现的官方、民间、官民共建等三种模式,探讨权力、利益、资源、地缘等要素与信仰建构的内在联结。^[61]段早青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阐释了晚明至民国晋东南炎帝传统的动态演变,剖析其映射的区域历史的复杂性与连续性。^[62]李峰等探析清代山西泽州炎帝造像实践过程中的礼俗互动过程,认为其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多元兼容的特质。^[63]

三、炎帝神农文化研究的延展向度

四十年来,学界聚焦炎帝神农文化,通过史料考证、田野调查与理论分析,形成了地域性与整体性探讨并重、本生态与衍生态分析并行,以及方法与视域持续拓展等主要态势。然而,如能在比较研究、现象研究和理论研究等领域有所突破,则有助于推动炎帝神农文化研究向更具学术创造力与现实解释力的方向纵深发展。

(一)基于地域语境,深化比较研究

地方构成文化生发的根基,文化根植于特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并受其模塑,作为多地域历时性互动交融中生成的文化复合体,炎帝神农文化展现出显著的空间扩布性与形态多样性。既有研究已初步形成地域性与整体性并举的学术格局,前者聚焦于地域文化的深描与微观实践的解析,后者则倾向于对多地域的炎帝神农文化分而论之,力图勾勒出炎帝神农文化的整体图景。但基于比较视域探讨各地炎帝神农文化异同及其内在因由的相关研究仍显

薄弱,对炎帝神农文化的认知处于点状分散的碎片化状态,难以实现有效整合。文化本质上是动态交织的关系网络,地域语境的异质性造就了炎帝神农文化在表现方式、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分异,中华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则维系着各地文化间的内在统一性,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比较研究的匮乏,不仅难以凸显各地炎帝神农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亦难以揭示各地文化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应立足地域语境,深化比较研究,进而建构起对炎帝神农文化的系统性认知。

一方面,文化差异性发挥地方比较优势的关键。伴随经济文化化与文化经济化的发展,炎帝神农文化研究实现了从本体溯源向资源利用的转化,加之公众追求独特性体验的消费趋向,促使地方比较优势的发掘成为文化转化利用的关键途径。综观既有研究,如付婧璇聚焦炎帝节文化品牌、文化庆典,以及文化产业的创新,探讨推动区域旅游文化消费的途径^[64],阳单丹探析基于炎帝文化的炎陵特色农产品包装的优化策略^[65],多囿于特定学科视域,聚焦单一地域的炎帝神农文化转化利用实践,跨地域比较研究处于缺位状态。地方文化比较优势的精准发掘,需基于地方语境开展比较研究,例如,山西干旱频发的自然特征,促使其衍生出集中体现抗旱主题的炎帝神农传说并形成独特的祈雨仪式;在湖南安仁饥荒与瘟疫等频发的社会语境下,炎帝神农的药神格深度契合了民众的健康诉求,衍生出“药王节”这一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节庆。因此,需融合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旅游学等多学科视角与研究方法,基于各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进行系统性比较考察,进而凸显炎帝神农文化的地域特色,为炎帝神农文化的转化利用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文化共性是联结多民族情感的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66]炎帝神农文化作为各民族互促共生历史进程中共创共建共享的优秀传统文化,其多元表现形式内蕴着多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准则,是联结民族情感的精神纽带,也是助推社会发展的核心动能。例如,围绕炎帝神农开创农耕这一功绩,便有土家族神话《神农老娘挤奶浆》、瑶族故事《龙犬盗谷种》等多元叙事文本,虽说存在情节分化与角色增殖,但其深层结构仍呈现出高度统一的价值内核,即实践动机始终锚定于民生福祉

的利他性追求,价值内核则具象化为艰苦奋斗的行动伦理。当各民族藉由炎帝神农文化的具象性表达感知到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内核时,就能够深化共同体认同,从而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内生动力。同时,炎帝神农文化具有超越国界的整合力,其以基于汉字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形成的共有价值观为内核,将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连成一个文化的以及命运的想象共同体。^[67]基于此,应系统梳理各地域各民族炎帝神农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实践样态,在比较视域中通过形式抽绎、互动考察、价值剖析等方式,提炼其共同精神内核,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社会发展动能,奠定情感根基。

(二)立足时代背景,增强现象研究

四十年来,炎帝神农文化研究的重心呈现出从本生态向衍生态递进的趋向,前者呈现为时空稳定并体现本质的生态,后者则是在时空演进中变化的、衍生的部分。^[68]伴随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结构加速转型,炎帝神农文化的衍生态日益丰富,并成为研究焦点。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文化产业正式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由此激发了以炎帝神农文化为核心的旅游开发、文创设计等产业化实践,亦推动了学界的相关探讨。然而,既有研究大多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探析其实践效能,未能充分回应实践过程中涌现的新兴现象。“现象”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周易·系辞上传》,其中提出“见乃谓之象”,“天垂象,见吉凶”。^[69]可见,“现象”不仅指涉事物的外在表征,亦是把握其内在规律的重要途径,故现象剖析实为揭示研究对象本质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一,聚焦炎帝神农文化传承主体的拓展。当代炎帝神农文化的产业化实践推动其传承主体的拓展,从社会学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涉及政府、企业、学者、民众等人类行动者与互联网、技术工具等非人类行动者。其传承途径亦由无意识的赓续转向有意识的文化再生产,“体现在从文化主体不经意的非正式形式为主的自发传承转向了各种非文化主体的他者传承”^[70]。进而言之,多元主体基于自身立场的传承实践,衍生出诸多新现象与亟待回应的命题。于人类行动者而言,政府如何在保障炎帝神农文化传承连续性的同时,切实激活公众作为传承主体的能动性?企业如何构建平衡机制,避免因市场逻辑导向而稀释炎帝神农文化本真性?炎帝祭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其固有的权力格局

与主体间关系发生了何种转变?于非人类行动者而言,在炎帝神农遗址遗迹、祭祀实践与传说故事的数字化转化中,怎样合理利用技术工具以避免工具理性对文化伦理价值的遮蔽?针对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可通过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结合线上数据搜集分析,系统剖析多元行动者间的转译机制与关键影响因素,基于内在规律与当代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应对炎帝神农文化发展中出现的新兴现象提供方法论指引。

其二,关注公众的主动性文化创造实践。在社会文化素养持续提升与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语境下,公众兼具文化接受者与创造者的双重角色,围绕炎帝神农文化,通过拟人化、可爱化、颠覆化等策略进行文化再创作,生成“神话段子”“绘本”“卡通形象”等多元文化形态。此种实践本质上是公众精神世界的主动投射与自我表达,既寄寓着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亦映射出个体的思想情感,是公众主动发挥创造力的新兴文化现象,部分内容亦被归入亚文化范畴。为此,可借助青年亚文化理论、符号学分析框架与认同研究范式等,探析此种现象的深层动机及作用机制,既能够拓展炎帝神农文化的研究视域,又能够回应传统文化融入当代日常生活与个体心理变迁等时代命题。例如,祝鹏程认为网民以戏谑化的方式改编经典神话的现象,契合了网民群体的言说诉求并丰富了神话表现形式^[71];李振鹏认为“泛民俗”已然成为当代青年群体抗衡“内卷”与构建趣缘群体的策略性工具^[72]。上述研究皆基于对新兴现象的剖析,为理解当代个体的文化选择提供了实证案例。

(三)锚定本土视域,加强理论研究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73]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立足本土、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系统,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炎帝神农文化贯穿中华民族发展的长时段历史进程,层累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与生存智慧,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鲜活载体。

综观炎帝神农文化研究,于方法论层面,已日益从历史学拓展至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并同步吸纳国际理论以开阔研究视域。于实践层面,从以历史考证、田野调查为主的定性分析,向基于数据检索的定量分析延伸。而在融通多学科方法观照研究客体时,进行理论探索无疑有助于切

近客体本质。以炎帝神农文化叙事为例,自古迄今其表现形式涵括故事、神话、传说等多种体裁,且各体裁间呈现出显著的交融性,决定了其对整合性理论的需求。刘守华提出的“故事诗学”理论命题关注到中国本土材料混融性的实际传承形态,超越了民间文学体裁分类局限,将民间故事拓展为涵盖神话、传说、故事,以及作家改写文本的大故事文类,为炎帝神农叙事的整体性分析提供了理论指引。^[74]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对炎帝神农文化的事实描述与经验阐释,理论建构层面的成果付之阙如。同时,作为中华民族与本土自然环境、社会语境协调共生中孕育的智慧结晶,炎帝神农文化是探索中国特色理论的重要载体。因此,亟须深化对炎帝神农文化核心特质与演进逻辑的系统性分析,探索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理论范式,进而为相关研究提供本土理论支撑,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互嵌融合。

一方面,在横向比较中提炼炎帝神农文化内蕴的中华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成为承载多重文化意涵的箭垛式人物,其寄寓着中华民族对理想品格的向往,是中华价值观的具象化呈现。“价值观的特色一般是通过不同理念和事物进行比较、选择、取舍而显示出来的。”^[75]由此,可以将炎帝神农与西方文明中的始源型人物进行对勘,通过语义分析、象征性符号解析及叙事结构对比等方式,深入辨析二者在叙事逻辑、形象特质及价值取向等层面的根本差异,以凸显并提炼中华价值观,为理论探索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在纵向流变中探析炎帝神农文化的调适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的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73]。炎帝神农文化植根于本土民众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探析其不同历史语境中多元主体的调适策略,可为当代中国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危机与调适困境提供历史镜鉴与实践指引。进而言之,炎帝神农文化的传承呈现出核心内蕴稳定性与表达形式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例如,秦汉时期侧重其神话叙事与权威象征的建构,唐宋以降其世俗化面向则日益凸显,但其皆指向伦理本位的价值准则。由此,相关研究需首先于特定历史语境与社会关系网络中,剖析个体在赓续精神内核基础上进行的文化调适与创造性实践,继而通过跨时代的历时性梳理,提炼其共通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规律,探析能够切实回应中国问题的本土理论,在古今贯通中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四、结语

综观四十年来的炎帝神农文化研究,涉及身份辨析、故里考证、精神凝练、贡献梳理与信仰剖析等维度,形成了地域性与整体性探讨并重、本生态与衍生态分析并行,以及方法与视域持续拓展等主要态势,然而,仍存在比较研究深度不足、现象分析维度单一以及本土理论创新缺位等局限。有鉴于此,未来理应以炎帝神农文化为基点,于地域文化比较中探析中华文化的有机整体性,于时代变迁中深化对社会现象的规律性认识,最终在本土视域下实现中国自主知识的原创性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史研究对文本内容的聚焦,使得学人的主体性价值长期被遮蔽。学术文本作为学人思维的具象化产物,不可避免受到个体认知倾向的影响。因此,应进一步探赜学人认知的多样性、统一性与动态性,而在地的历时性层累所赋予传统文化的本土性、连续性与丰富性等特质,恰为此种治学取向提供了核心载体。有鉴于此,传统文化的学术史考察应兼具双重指向,既涵括对研究脉络的系统性梳理及发展态势的总结与展望,亦通过对学人阐释范式、价值取向等维度的探析,揭示中华民族的共通性思维逻辑与心理图式,以期在推动特定研究领域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提炼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强化自信自觉中巩固文化主体性^[76]。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N]. 人民日报,2022-05-29(1).
- [2]刘玉堂. 炎帝神农文化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3]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4]孙正国. 现代学术转型期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缺失[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 [5]张玉勤. 神农、炎帝、黄帝关系辨[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3).
- [6]林生. 神农氏、炎帝与传统文化[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
- [7]余卫国. 炎帝神农合称的文化意蕴——兼论炎帝、神农的时代问题[J]. 华夏文化,1994(3).
- [8]周及徐. “炎帝神农说”辨伪[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 [9]田兆元,明亮. 论炎帝所谓的诸种模式与两汉文化逻辑[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 [10]龚维英. “炎帝神农氏”形成过程探索[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2).
- [11]刘玉堂,刘礼堂. 炎帝、神农氏、烈山氏的分合因由——兼论远古

- 传说变异与原始民族融合之关系[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 [12]杨善群. 炎帝与神农氏“合二为一”考辨[J]. 探索与争鸣,2007(8).
- [13]李桂民. 神农氏、烈山氏、炎帝的纠葛与远古传说的认识问题[J]. 理论学刊,2012(3).
- [14]雷欣翰. 早期神农传说及其文化意涵考论[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 [15]宋海燕. “炎帝神农氏”考略[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
- [16]庞政,赵祖蔚. 汉代的神农、炎帝图像及相关问题研究[J]. 宏德学刊,2024(1).
- [17]江长林,谢志华,李明享. 考研炎帝神农,开拓民族文化[J]. 湖北社会科学,1990(1).
- [18]胡立志,祁绍文. 炎帝神农起于南方考[J]. 理论月刊,1991(2).
- [19]李汉伟. 炎帝生于随州传说考[J]. 理论月刊,1991(2).
- [20]闵宗殿. 神农研究[J]. 古今农业,1992(2).
- [21]蒋南华. 炎帝——南方民族的始祖[J]. 贵州社会科学,1994(1).
- [22]张序民. 宝鸡:炎帝族之源[J]. 寻根,1997(1).
- [23]梁绍辉,任俊华. 炎陵考辨[J]. 求索,1999(4).
- [24]韩致中. 兴起于宝鸡 弘扬于厉山——漫话炎帝神农[J]. 民间文学论坛,1992(5).
- [25]巫瑞书. 论炎帝陵传说圈及其原始文化意义[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3).
- [26]林河. 炎帝出生地的文化考析[J]. 民族艺术,1997(2).
- [27]刘玉堂,刘礼堂. 炎帝神农氏生地揭秘——原始民族早期生息与劳作之地的个案剖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
- [28]侯文宣. 晋东南一带炎帝历史传说、民俗文化考释[J]. 晋阳学刊,2005(5).
- [29]刘毓庆. 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30]钱宗范,朱文涛. 炎帝和炎帝文化辨析[J]. 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5(1).
- [31]宋超. “长于姜水”、“都陈”与“葬于长沙”——炎帝传说流衍途径考察[J]. 史学月刊,2010(4).
- [32]马平安. 炎帝文化与中华文明[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23.
- [33]刘芳,刘多. 试论炎帝的舍己为群[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1).
- [34]陈望衡. 试论炎帝精神[J]. 湖北社会科学,2001(6).
- [35]许启贤. 从炎帝传说研究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 [36]陈胜利. 炎帝文化与时代精神[J].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4).
- [37]唐志丹,费素斌. 炎帝神农氏的管理思想[J]. 辽宁科技大学学报,2009(1).
- [38]段友文,林玲. 炎帝神话与华夏农业文明的形成[J]. 中国农史,2023(4).
- [39]马平安. 炎帝精神:中华文明的血脉基因[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7).
- [40]杨范中. 炎帝神农氏与中国农耕文化[J]. 理论月刊,1991(2).
- [41]吴家阔. 神农发现茶叶解毒治病的民间传说[J]. 农业考古,1993

- (2).
- [42]霍彦儒. 炎帝与中国饮食文化[J]. 华夏文化, 2002(3).
- [43]唐朝阳, 朱建军. 由神农琴谈及乐祖炎帝及其影响[J].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
- [44]丁凤英. 炎帝神农与中医药文化[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5.
- [45]张玲丽. 由“神农尝百草”论炎帝神农对中医药文化的贡献与影响[J].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2015(3).
- [46]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内蒙古考察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N]. 人民日报, 2023-06-10(3).
- [47]刘玉堂, 刘晓慧, 黄莹. 炎帝神农文化研究[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3.
- [48]孟琳峰. 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炎帝叙事研究[D].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23.
- [49]吴新锋, 张钰青. 炎帝神话多元一体建构与在地化仪式重构——以湖南炎陵县炎帝陵为中心[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2).
- [50]王爽, 谢文强. 方志文本中的炎帝叙述与中华文化认同——以LoGaRT工具为中心[J/OL]. 信阳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06-24].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ohczU4sk2p_NSDJR7xvV3Bd7FKnjup8IGuiSdhZ4hICuIZ5MymuMIEZudN1X7zgSyLb6NsXEQj41s_slleNrNVkUMfEXgfgNjLengC3_qrE=&uniplatform=NZKPT&index=1.
- [51]袁珂. 古神话选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52]盛磊. 随州炎帝神农祭祀及其灵验故事调查[J]. 民间文化论坛, 2012(2).
- [53]刘守华. 炎帝神农传说在湖北的口头传承[J].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4).
- [54]吉成名. 炎帝祭祀与文化遗产[J]. 湘南学院学报, 2019(1).
- [55]贾志杰, 杨利慧. 炎帝神话的地方性——以山西省高平市神农镇神话为例[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 [56]张硕. 论宋代炎帝国家祭祀与炎帝形象诗歌书写及其意义[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
- [57]崔莹莹. 沁阳神农传说的景观生产与叙事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 2022.
- [58]曾园. 炎帝神农神话多维叙事传统与当代发展研究[D]. 中南民族大学, 2023.
- [59]刘晓春. 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J]. 民俗研究, 2009(2).
- [60]郭艳芳. 山西东南部炎帝传说与信仰研究[D]. 山西师范大学, 2011.
- [61]赵翠翠, 李向平. 信仰类型及其社会建构——以陕西宝鸡地区的炎帝信仰为例[J]. 民俗研究, 2014(1).
- [62]段早青. 晚明至民国晋东南炎帝传统与区域社会研究[D]. 山西大学, 2016.
- [63]李峰, 尹振兴. 炎帝民间武神形象特征与历史成因——基于山西泽州清代炎帝造像的考察[J]. 装饰, 2021(9).
- [64]付婧璇. “炎帝节”推动区域旅游文化消费的创新策略研究[D]. 湖北大学, 2024.
- [65]阳单丹. 基于炎帝文化的株洲炎陵特色农产品包装设计[D]. 湖南工业大学, 2024.
- [66]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67]杨志强. “蚩尤平反”与“炎黄子孙”——兼论近代以来中国国民整合的两条路线[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
- [68]宋德华.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生态与衍生态[J]. 民俗研究, 2008(4).
- [69]李鼎祚. 周易集解[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70]徐赣丽. 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J]. 民俗研究, 2015(3).
- [71]祝鹏程. “神话段子”: 互联网中的传统重构[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4).
- [72]李振鹏. 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及其泛民俗发轫[J]. 上海文化, 2024(2).
- [73]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 人民日报, 2022-04-26(1).
- [74]孙正国. 故事诗学的学科语境及其理论建构[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1).
- [75]陈来. 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N]. 人民日报, 2015-03-04(7).
- [76]底亚星, 冀文亚. 在强化自信自觉中巩固文化主体性[N]. 光明日报, 2025-11-14(11).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琛 E-mail: qiangchen42@163.com